

★ 期 一 十 七 第 ★

號 出 日 一 月 八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讀 書 通 訊

刊 月 半

目 錄

張掖的廟宇.....勞貞一	「使日回憶錄」與「日本人」.....陳琪	訪勝記遊	圖書評介	升學與就業.....董渭川	生活指導	讀書指導	研究工作的性質(續完).....羅華田	學術講座	章太炎學述.....曹聚仁
---------------	----------------------	------	------	---------------	------	------	---------------------	------	---------------

所 一 行 發

會 書 讀 社 務 服 化 文 國 中

(號 九 十 三 街 器 慶 重)

號 四 五 七 第 郵 局 理 行 政 郵 川 東 類 紙 聞 新 類 一 第 爲 認 記 登 政 郵 華 中

哲學、倫理哲學有充分研究不露痕跡。讀者先把本書第二、三兩章看了，再讀一個大綱，再把中國哲學史看一看，心中自有個底子，再來讀這些文章，那時會引為入勝，使你驚嘆，知其汲取不盡的。筆者知道有些朋友，會動筆寫之作集註，積年累月，終於擱筆，也可見讀此書之不易。

（二）補說一句，若要讀他的哲學，還得讀他的「齊物論釋」。

二

將「國學概論」這本書列入青年文庫，那是應該為青年讀者着想的。青年讀者並不一定去研究中國古代的學術，也不一定精治經學或哲學，知道一點中國學術流變的梗概，也就很夠了。現在離開章先生講演國學時，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間，中國學術界的突飛猛進，更為我們的青年讀者所不可不知，筆者就借此機會來敘述一下：

現代學術家（乾嘉年間的經學家），無論是說學或與學，他們只建立了研究方法的精神——客觀的考證法；他們所研究的範圍，非常之狹，只限於儒家經典。到了晚清，研究的範圍加廣了，如孫詒讓之治《周禮》，王先謙之治《莊子》，……考證校勘的對象，推及於諸子百家，章太炎先生也就是在這一方向有成就的。

到了民國十一年前後（即太炎先生講演國學時），胡適和顧頡剛的新考證學起來了，他們所用的方法，因為受了科學方法的洗練，進而更加精密；他們所研究的範圍，是戲曲、小說、以及歌謠、風俗，範圍更加廣大。胡適的「紅樓夢考」，顧頡剛的「古史辨」，開闢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胡氏並不以此為自限之境，他告訴青年：單單有正確的研究方法和精神，還是不夠的，必須認清研究的對象，若只把這方法和精神在舊紙堆中打圈子，也是沒有用的。他要把研究的對象擴開，以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為新的研究範圍，這也可說是一大進步。（我們且想：章太炎先生在音韻學上的成就

，總算不錯的了；但比之劉勰在巴黎大學由於留聲機上所得的結論，又算得什麼呢？）

另一方面，由於近五十年來地下古代史料的發見，中國古代學術的真面目，漸漸顯露了；代表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的新徽幟，是王國維、顧頡剛、李濟、郭沫若……這一羣人，太炎先生的語文學、史學，在新的閃光下，又黯然無光了。若非中日戰爭破壞了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近十年間的成就，將更可觀。我們得承認，今後五十年間，將是重寫中國古代史，重讀中國書的時期，我們應該隨時「揚棄」舊的知識，接受新的知識。

太炎先生講演國學那一年，中國談哲學的，只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綱」一卷。依章先生看來，這部書還是不夠精到的，即胡氏用力最多的關於儒家哲學那一部，也還是粗疏得很。佛學方面，梁啟超、夏含璽諸氏，都有所述作，比之章氏的成就，也還差得遠。但近年間，如錢穆、馮友蘭諸氏的成就，却不能不刮眼相看了。馮氏的「中國哲學史」和「新理學」，至少可以和章氏談名說性諸篇並駕齊驅，而錢穆對於宋明理學的深入，更在章氏談儒學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太炎先生所發中華文化將衰頹的歎息，我們看來，那是多餘的！

由於中國特性抗戰在世界所爭取的新地位，我們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自信心自覺性，漸漸恢復了，筆者只怕流於「自大」或「自封」，儘量地希望青年讀者，接受了自己的文化遺產，切不可為舊時代的思想所中毒，天天在故紙堆中打圈子。筆者在這本書的瓦版序文，曾引馮易卜生的一句話，現在仍抄在邊兒。易卜生說：

「信不信由你們；但是真理的壽命，並不能像古人美修拉拔那隻活八百歲。一箱尋常的真理，照例不過活十七八年，或者至多二十年，要易換有再多的了。」

三十二年春在重慶

(二)意見 他據新唐書地理志認為「碎葉條支在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平高麗，高宗顯慶二年(六五七)平黃疊，其間中國政治勢力範圍之廣，始可成爲歐羅巴人之地。若太白先人於楊隋末世即寓居斯地，斷非當日稍新近者之事實。」

(三)證據 又考太白集卷二六爲宋中丞自薦表云：「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七。」太白爲宋若思作此表時，爲唐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據以上推其誕生之歲應爲武后大足元年(七〇一)。此年下距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尚有四年之隔。然則太白由西域遷居蜀廣漢之時其年至少已五歲矣。」

(四)結論 「是太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也。又考李序「神龍之始逃歸於蜀，直指李樹而生伯陽，及范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之語，則是太白至中國後方姓李也。」

他得到這個結論後，還爲新唐書一九〇下交苑傳李白傳既載不可復解之一父爲狂城尉，因家焉」之語，又稱白爲「山東人」，未免遺退失據。因爲山東非唐代州縣名，以郡望應稱「郡人」，以居住地爲籍貫亦應稱「兗州魯郡任城人」。

例五 胡適紅樓夢的著者是誰？(節錄胡適文存卷三，紅樓夢考證頁八二二至八五四)

(一)問題 紅樓夢的著者究竟是誰？他的事蹟家世和著書的年代如何？
(二)意見 這部書第一回所說原稿是空空道人從一塊石頭上抄寫下來的，那是依託的話；真正的著者就是那「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曹雪芹。

提出這個假設以後，胡先生又根據袁枚隨園詩話卷二裏記載曹棟亭的一條，知道(1)乾隆時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作的；(2)曹雪芹是曹棟亭的兒子；(3)大體圖就是後來的隨園。

從這些線索，他再用剝繭抽絲的方法去探討，於是又根據吳鼐的職代各人尺牘小傳卷十二，揚州畫舫錄卷二，韓奕有懷堂文稿裏的棟亭記，曹雪芹的兩辰觀記，宋和的陳年傳，江南通志，四庫全書提要附錄

全書之屬存目裏的居常飲饌錄條和別集類存目裏的棟亭詩餘條，八旗氏族譜牒，錢保所輯朝雅頌集，棟亭書目等書，關於曹寅的事蹟考得四條結論：

(1)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幾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親曹鍾麟守二十一年的江寧糧道，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江寧糧道，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糧道，同時又兼做了四年的兩淮巡鹽御史。他死後，他的兒子曹頤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寧糧道，他的兒子曹頡接下去做了十三年的江寧糧道。他家祖孫三代均曾入獄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糧道，這顯然是成了他家的「世職」了。

(2)曹寅是極富的世家，他家會辦過四次以上的接濟的善。

(3)曹寅會寫字，會做詩詞，有詩詞集行世；他在揚州會督鑄全唐詩的刻印，揚州的詩局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幾種精刻的書。他家中藏書極多，精本有三百八十七種之多，可見他的家庭富有文學藝術的環境。

(4)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六五八——一七一三)。

曹寅的傳和他的家世既然清楚了，那麼，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麼人呢？胡先生又根據錢謙益雪橋詩話卷六所記曹棟亭事小與曹雅頤集裏所載曹鍾麟教訓兒弟關於曹雪芹的詩，及族文經裏所載錢謙益的隨園有年月可考的文字，考出下面幾件事：

(1)曹雪芹名情，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
(2)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得很不像樣子。

(3)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裏，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

(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又說：「我們可以猜想曹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末年(約一七一三)至一七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五歲左右。

考證改定後大約半年，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胡先生得到教誠的
胡松堂集又補充了兩點：

(1)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2) 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有餘」。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
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
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

(3) 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
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4) 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甄雪芹」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
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了。（胡適文存二卷卷四跋紅
樓夢考證頁一六九至一七六）

民國十七年胡先生得到胡適齋重評石頭記原本，又作了一篇「考證
紅樓夢的新材料」，再把他以前所考證訂了兩點：

(1) 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曹雪芹死之前九年，紅樓夢至少已有一
部分寫定成書，有人「抄閱重評」了。

(2) 曹雪芹死在乾隆壬午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胡適文存三卷卷五頁五六九，五七〇，六〇一）。

他根據這些關於曹雪芹個人和他家世的材料，更提出一個進一步的
假說：

「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文存卷三頁八四〇）。

胡先生怎樣應用這些材料來證實他的假說呢？他舉出了五條重要
的證據。

第一 這部書的開端已經清清楚楚的說明紅樓夢是一部「將真事隱去」
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
個深自憐憐的「我」！即是曹家的賈寶（真假）兩朝寶玉的底本

第二 加一則裏那塊石頭已經明白清楚的說，「這書是我自己的事情
體」，「是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

第三 第十六回有談論南巡接駕的一大段，可以作曹家曾經接駕四次的
映照。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接駕的大典

說了出來。足徵這裏所說的甄家曹家都是曹家。

第四 拿第二回所敘榮國府的世次和八旗氏族譜卷七十四所記曹家世
系比較，可以認曹政即是曹頌，曹寶玉即是曹雪芹。

第五 紅樓夢所寫曹寶玉的歷史和他家家庭環境多與曹雪芹相合。又曹
寶玉是刻居常飲饌的人，我們讀紅樓夢時看寶玉對於飲食的講究
，看寶玉上下對於飲食的講究，便知道居常飲饌的遺風未泯。

此外，像雍正誅批諭旨第四十八册載有雍正元年蘇州織造胡鳳聲
奏陳他的前任，曹寶的親家李煦辭款事，第十三册載有兩淮巡鹽
御史奏請追還李煦所辦兩淮鹽款事，都可以映襯曹家衰落的情形
，大概這兩親家的下場相差不遠。況且「哀救的陳國記（小倉山
房文集十二）說，陳國本名隋國，主人為康熙時織造隋公。此隋
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頌任的人。（哀救誤記為康熙時，實為
雍正六年）。哀救作記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去曹頌下
任時甚近，他應該知道這國的歷史。我們從此可推想曹頌當雍正
六年去職時，必是因虧空被追賠，故這國子就到了他的繼任人的
手裏。從此以後，曹家在江南的家產都完了，故不能不搬北京歸
住。這大概是曹雪芹所以流落在北京的原因。」我們看了李煦曹
頌兩家敗落的大概情形，再回頭來看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和第七十
二回所寫賈家中落的情形，就更容易明白了。「紅樓夢只是老老
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

（胡適文存卷三，頁八〇四至八五三）。

後來胡先生得到胡適齋重評石頭記的原本後，根據它的誅批又把第
十六回裏所說「南巡接駕」一大段寫成是康熙南巡，曹寶四次接駕，
和用八旗氏族譜的曹家世系與第二回冷子興所說的曹家世系來比較，
認為曹政即是曹頌，那兩個假說，加了一層有力的證實。於是他很果決
的說：

「故紅樓夢是寫曹家的事，這一點現在得了許多新證據，更是顯真
的說：」

「故紅樓夢是寫曹家的事，這一點現在得了許多新證據，更是顯真
的說：」

「故紅樓夢是寫曹家的事，這一點現在得了許多新證據，更是顯真
的說：」

「故紅樓夢是寫曹家的事，這一點現在得了許多新證據，更是顯真
的說：」

- 他把無關重要的記下來。
- 3 閱讀時，我必須把讀物重讀好幾遍——第一次讀時總弄了詳細的意義。
 - 4 我對於學習的東西總是給牠做個提要，分類或系統化，使牠和從前所學的材料聯絡起來。
 - 5 我讀書太慢，以致不能把指定參考書和課外讀物讀完。
 - 6 我感覺我停學太久，或基本科目學過之長時間太長了。
 - 7 我常常做一些「過度的學習」，超過立刻記憶或回憶所需要的程度。
 - 8 國文算學等基本科目沒有弄好，使我吃虧不少，以致學業成績不好。
 - 9 二、專心致志的習慣
 - 10 我很難專心於所讀的東西——常常讀過之後還不知道念的是什麼。
 - 11 當我讀書時我常有「走神」，做很多的幻想。
 - 12 以讀書時我總要相當的時候，才能安下心来，讀書起勁。
 - 13 我總覺得心機極好，或「靈感」一來時，才開一種工作，我常浪費時間。
 - 14 讀書時一點小的聲音就能擾亂我的思想，我很難有效地集中注意研究。
 - 15 我總是在強制之下，於一定時間內完成我的工作；工作總是沒有做完，或沒有做好，或太遲了。

讀書測驗計分表

題目	從不 或 很少	有時	常 或 總是
1	5	-4	-5
2	5	-4	-5
3	4	-3	-2
4	-5	1	1
5	2	-3	-1
6	4	-4	-3
7	-1	-2	5
8	3	-3	2
9	7	-4	-7
10	5	-2	-4
11	5	0	-6
12	4	-2	-4
13	3	-2	-3
14	5	-2	-4
15	4	-3	-3
16	6	-4	-3
17	7	-6	-3
18	6	5	-5
19	3	0	-5
20	-1	-2	4
21	9	-7	-6
22	4	-3	4
23	3	-2	-5
24	4	-2	-2
25	2	0	4
26	4	-7	4
27	-2	-2	5
28	-2	-3	4
29	5	5	-11
30	-5	1	5

- 15 我的喜劇讀物，打開，妨礙了我的讀書。
 - 16 我必須在能吃飯的地方，才能讀書；在圖書館讀書時，我總跑出來吃煙。
 - 17 我非常討厭一些課程和教員，他們使我的成績不好。
 - 18 我讀小說看電影太多，妨礙了我的成績。
 - 19 我工作的時間常是太長，以致不能專心，做得順手。
 - 20 我對細心地分配我學習動機的時間，——寫筆記，留出時間做每天或禮拜的溫習；集中練習我學得最不好的地方。
 - 21 在考試時，我總是過分興奮不安，以致本來知道的却答不出來。
 - 22 讀書時我總是當時弄明白，而不是讀完之後再回頭研究不清楚的地方。
 - 23 我願與同人一起研究，而不喜一人單獨工作。
 - 24 我常覺得太疲乏，太愚昧，精神未不好，以致不能有效地讀書。
 - 25 我覺得練習做得太少。
 - 26 感覺上或身體上的缺乏；或時常患病，妨礙了我的讀書。
 - 27 所有動功課的綱要我都細心研究。
 - 28 我常為讀書開夜車，甚至有時不睡覺，不吃飯。
 - 29 我的時間分配得不好，在有的功課上用的太多，有的功課上用的太少。
 - 30 我常把一門功課中所學的東西和另一門功課中所學的關聯起來。
- 把三十個題目都做完了之後，就按下表自己計分。

例如對第一套作「不」便得一分，如答「有」便得一分。對第二套作「不」便得一分，答「有」便得一分。餘類推。把每題應得的分數都寫在題目下面，然後總加起來（計算正負數）就是總分數。

這每題題目上每種答案的分數是按照成績好的和成績壞的兩組學生作這一種回答的人數的百分數的差異而定的。對一個題目的一種答案，兩組的差異越大，就表示由這個題目的答案能區別成績好的人和成績壞的人（因為成績好的人是一種答案，成績壞的人又是另一種答案。假定他們的智慧是相等的。）也就表示這個題目所描述的那種習慣對於學業成績的影響越大，也就給這題目的分數越趨越高，以表示其重要。例如對第一個問題，答「從不成很少」的人在成績好的九十人中所佔的百分數和成績壞的五十人中所佔的百分數，二者的差異越大，這個問題上「從不成很少」的分數就越高。具體地規定各題案的分數的高低，瑞恩應用了兩種方法：第一種是以兩組百分數的差數的模數除差數，再將所得的商數平方，即作為分數。第二種是照凱雷（Kilgus）的公式，按兩組百分數的差異，依斯朋（E. W. Spence）的加重分數表直接定下來的。由第一種方法定的分數，成績好的一組有百分之八的人的分數低於成績壞的一組的中數；由第二種方法定的分數，成績好的一組有百分之九的人的分數低於成績壞的一組的中數。這兩種方法定的分數，以兩組分數分交變的情形而論，可謂相差無幾。因

為由第二種方法所定的分數，對目字的絕對值較小，便于計算，於是就應用了牠作為正式測驗中的分數。前面計分表中的分數就是這樣得來的。

每個題目上每種答案的分數，正的分數表示好的習慣或沒有壞的習慣，負的分數代表相反的情形，所以在任何一個題目上所得的分數就可表示這種特種習慣的良否，或應有應無。總分數則代表一個人的讀書習慣，從整體看來，大致良否，是優良的習慣佔優勢，還是不良的習慣佔優勢。總分數多就表示優良的習慣多，分數少就表示優良的習慣少。

照上述的計分方法，原來的兩組人（九十對）所得的分數如下：

別	廿五分數	中數	七十五分數
成績好的一組	24	46	70
成績壞的一組	34	12	19

這兩組的，都是畢業成績特別好的或特別壞的，所以他們的分數不能作為常模，只可供參考。瑞恩會用這個測驗測驗大量的二年級學生，所得的中數是55，這就可作為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常模，以供比較之用。

所以，一個人所得的總分數，如在55（接近斯坦夫大學中成績優異的學生的中數）以上，就表示讀書的習慣很好，如有必需的智慧和努力，學業成績一定會好；如果在55大學一年級學生的中數以下，就表示讀書的習慣有問題，需要自己注意改正。不過也不要過分注重總分數的多寡，因為一個問題中所敘述的一種特殊的習慣，也許影響很大；所以除了計算總分數以外，最好再注意一下個別題目

的分數。如果在一個題目上得了一個很高的負分數，特別是因答案「從不成很少」或「時常或總是」而得的，更需要特別注意，這是需要改正的不良的習慣。要以最大的決心持久的努力，以在牠上發現自己讀書習慣的良窳，然後保持著優良的作風，改正不良的習慣，這是實施這個測驗的主要目的。所以這個測驗，個人應用，（1）可以知道自己一般的讀書習慣的良否（總分數），（2）知道自己特殊的優良的與不良的習慣（個別題目的分數），因而能（3）知道自己應當保持或改正那種特殊的習慣。教育工作者應用：（1）對成績低劣的學生作診斷，（2）對新入學或開始學習某種課程的學生作檢查，為編製學習指導方案的參考。

我們前面說過，影響學業成績的條件很多，對於智慧相等學習機會相同的人，不單單由讀書學習的方法習慣決定學業成績的高低，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讀書學習的方法習慣是一個有力的因素，因之我們也相信這個讀書習慣測驗可以給有志向學的青年以不少的幫助。

（完）

本刊下期要目

社會學與社會科學之關係	許維新
宋史志之校算	李長之
文學史與文學批評	李長之
升學與就業	李長之
陝西川籍自序	李長之
印度——不易瞭解的國家	李長之

這兩個易使青年彷徨苦悶的問題，是跟着我國所謂新教育產生的，幾十年來，很少有人從這兩大問題到正當的途徑的啓示。假如等到學生們行將畢業之際，才把這兩大問題提出，對他們作幾次一般的原則式的，而且是讀者主觀的談論，或許使青年們增加些微的感不安。與其讓青年們在渴渴井，反到不如提倡各級學校的教師（特別是中學教師）多作討論，如何於平日對此兩大問題打下一個基礎。只要這方面的基礎打得好，便是其全盤教育的偉大成績；打不好，或者忽略了此種工夫，便是全盤失敗。事實給我的強烈刺激，也可說是深到激訓，愈來愈多，所以我故作此種結論。近年來，青年們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建設新的中華民國兩種強力的鼓動，對其升學與就業問題益感重視，然而對於究竟升什麼學，就什麼業，似乎益感難以抉擇之苦。同時我國的教育也正因敵人砲火的轟擊而崩潰而改變而不得不走向徹底改造之路；倘能改造到使每一青年於升學就業兩者各得其宜，也就是了不起的革新。所以此種提出這兩個題目來討論，並非偶感而發。

（一）淪落一團的現象

在抄襲外洋的學制以前，我國的讀書人只知道「步步高陞」地進學，只希求「金榜題名」的快樂，大家走的是一條路，既無所謂升學，更無分門別類的對系。至於就業呢，「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這兩句老話充分顯示了既往士農工商這四種職業世襲的大原則。士，固然不能算作一種職業，然而當作準備做官看，也就是一種職業，而且居四民之首。至於做官，攬統官之，是從政，只有官級大小之分，用不着從橫一方面研究其性質分別。所以在舊時也不發生就什麼業的苦惱。至於失業問題，在農業社會中既看不出其嚴重性，而且所謂失業，正是一失官之謂。

廢科舉與學校以後，情勢便不同了。一方面因資本主義的壓迫使我們的手工業與農業急劇地發生衰頹崩潰的現象，某些受影響最直接的區域，被動地東施效顰，急起直追，遂形成了若干人口集中的都市，並且其工業商業也漸漸地呈現了西洋式的分類分工。另一方面我們的教育在形式上仿效了外國實業塔形的制度，在內容上抄襲了工商業社會的許多花樣；而分化的作用自小學教育階段起即行開始。在這種種趨勢之下，升學與就業遂成爲使青年們感覺嚴重的兩大問題。嚴重而得不到合理的適切的啓示，這不免產生下列幾種現象：

一是在青年們眼中認爲進小學是爲了升中學，進中學是爲了升大學，所升愈高，愈有出路，不識升到頂則是半途而廢。張之洞的「勸學篇」中說，雖然廢了科舉，而仍然「高科舉於學校」，幾十年來，正是跟着他這話走的。談到一個青年怎樣才得到出路時，答案是只要說往上升就成，用不着深究，至於某些人僅僅進過小學或者中學，甚或只是學徒出身，一天學校沒進過，而認成爲學問家事業家，青年們却很少注意，偶感難說，也只認爲是奇蹟是例外而已。

二是具有某些優越條件者（主要是經濟），總能儘其升學之目的，而於升什麼學，則是盲目地亂撞，按科考不上則考商科，商科考不上再考農科，要能考上則完成了理想。再或者考大勢所趨，人家多報考經濟，我也報考經濟；人家說今後學理工易有出路，我自然也非報考理工不可。至於自身各種條件究竟適於學什麼，自己對人生社會懷抱什麼理想，這問題儘可談談，先考進一所學校再說。及至考進之後，學了一年半載，因自身對所學之科本無所謂，「一山望著那山高」，急皇皇急於轉學轉科。我會看見若干理科的學生要求轉文科，理由是文科容易。我也曾看見一個大學生由甲學院轉入乙學院，又由乙學院轉入了丙學院。我自己也吃過這種苦頭，中學畢業後，依家庭的願望考入某大學的政濟系，而我的興趣則是學教育，一年之後，乃另行考入一所師範學校，前一年的光陰白費，在報考師範的時候，朋友告訴我，國文教師最缺乏，學國文易有出路，我於是懷着投機的心理報考國文系。可是學國文並非我的真正興趣所在，畢業後當國文教師的時間很短。有人說，學國文正好作了你此刻研究教育的基礎，這是揶揄是調侃，我的損失只有我知道！

三是中小學畢業生認爲因不能升學而就業，是迫出無奈的下策；至於就什麼業，則又惟地位與金錢是問；就進大學畢業，也往往擇業不以其所學爲準。社會不需要其所學，當然是另一方面原因。擇業的標準既只是地位與金錢，則因慾望無窮足之日，遂不易安於其位，而且思改業。教育既未盡大量供給各種專業的人才，政府只好於每辦一事，首先舉辦短期的講習會訓練班以應急需。青年們既時思改業，遂致彼此以混資格而獲出路。常見有人在數年之內輾轉各地進過幾種訓練班，嘗試過幾種性質不同的工作，到後來還是被轉桌身找不到安身之所。這種現象，對個人，對國家，是多麼大的損失！

（未完）

合力攻擊香港新加坡等處。等到獲得了那些地方，海陸軍雙方會發生相當的磨擦，但為了更遠大的戰爭，他們又會合在一起向前推進。

(二)青年訓練。高百里先生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何使日本的青年體格衰弱，他說：「諺稱日本文明者當然說他教育制度如何完備，國民學校如何發達；可是這教育勢力下所養成的學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各種職業中之最高度」。高先生還舉出許多數字來證實他的論斷。我相信高先生的解釋是對的。日本軍人近二三十年來強迫青年接受軍事教育和訓練，結果青年因為受了身體和思想上的壓迫，不能滿足自然的發展和要求，健康受到很大的折斷，或是為了逃避兵役故意戴起近視眼鏡。我們從這幾年的戰爭中知道日本士兵的質日益減弱，青年的苦悶日益增大。關於這一點魯格氏說得很詳細。他說：

一整個日本教育的觀念是在軍事形式的服從命令。我們視教育為基本原則的自由發展和合理的批評，在日本是並不發動的，學生的責任是聽從教師的講授，不許發問，考試時只是把學員聽來的答覆就是了。

一這子教育的程度是來自家庭和國家中的父權觀念。因為日本利己家制度的權威，照從一家之長，教導人民尊重天地的權威，她在家庭中尊重和服從父親一樣。

「這種一個日本幼童上學規定當他生時與一般孩子同樣的有着自我表現的機會，基本義務使他立刻會覺得四週有着權威的人包圍着而不能反抗。

在家庭中，他必須服從父親和兄長；在學校裏他必須服從教員，而且服從越軌一步，團體的力量立即懲罰他，日本小學生都訓練成平均發展，假使有特出的或異常的即被團體的力量加以壓制。這樣經過才變弄成愚昧，幼童才知道團體的力量。假使他也以為個人的慾望應置於團體的意志時，他即會感到不安與苦悶」。(見「使日回憶錄」第六章)。

日本軍人學着希特勒加緊地訓練青年，兩者國籍的在國家運命的深處隱伏着巨大的危機，尤其是缺乏內省能力的「大和民族」。

(三)「大和魂」。集權國家顯示着一種立憲的不可捉摸的靈魂以刺激和出奮人民。日本人以為自傲的即是所謂「大和魂」。高百里先生說：「這個大和魂，不僅是個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說明。據我看來，『大和魂』是說對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於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是大和魂的真諦。所謂一種刻板的異常變遷，是從佛教禪宗所謂『悟』所開一窺一而來的，但其中有厭世悲觀的色彩」。

這一種厭世悲觀的精神，在戰時的戰鬥之中所表示的是一種沒有思想的服從和肉體。高氏說：「日本自己種外世界觀察家的意見，使日本獲得勝利時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種滲透於帝國各軍營中的精神。這一種精神在戰時的個人認為是取得勝利最重要的不確定的因素，自從現代日本軍建立以來，曾一直加以保存和發揚。日本人將他地在他國軍隊中發揚了一種奮鬥的戰鬥精神，這是一種戰鬥精神在一般人民中也同樣的起了作用。」

日本軍隊在各戰場上到現在為止尚未演滅滅的進步，這一種精神將要達到如何樣的命運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在中東戰場上已感到惶恐，因而懷疑戰爭的前途，厭世和悲觀的色彩於是愈加顯現了。

(四)財政和經濟。高百里先生指出了日本自明治以來財政經濟的重心和財閥的地位。日本的財閥初和政黨相聯繫，後來和軍閥勾結，結果製造了戰爭，不但破壞了穩定的社會經濟制度，而且造成了國家破產的大危機，想害人却先害了自己。

關於日人所倡的所謂「東亞共榮圈」，格魯氏說：「……共榮的意思很簡單，其基本的含義是經濟，財政，軍事，政治的絕對獨霸，一言蔽之，即是「奴化」。

「侵略國的『生存空間』不容他人有生存的餘地，事實上只有殘酷的征服和野蠻的剝奪。當權的軍人並不顧到日本人民的幸福，只沉醉於他們侵略的夢中。他們對於出口商品或購買國際經濟的平衡，毫不注意。他們要備蓄與戰略有關的軍用原料，完成有價的無止境的核軍備案」。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軍閥在國內的聲譽愈來愈發張，軍事預算激增，政治和財政的勢力弄但無力限制軍隊的成長和行動，反而為軍部所控制。而那些大商業，如松島氏所說，受了誘惑時就說：「自己組織起來」，順從地投入政府的控制。在佔領區日本經營者更以種種藉口給與政府的控制。他更設立軍部以軍事命令為依據的經營制度，實行無節制，強迫通過日本軍閥這種方法來奪取外國，在這種殘酷的不公平的基礎上貿易，他們用公然

——18——

張掖的廟宇

張掖，是河西最大而最高的城。金張掖，銀武威，不取指河西，而且指全甘肅。馬可波羅遊歷時，

甘州也是唐古特的一個大城，並且是很大而且莊嚴的。在全唐古特中確是一個行政的郡邑。住民裏頗有偶像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有三個教派，偶像教徒也有他們形式的許多寺院。在這寺院之中有不同大小的塑像，大的塑像是有十步的身軀。這裏還有的是木造的，也有泥造和石造的，並且都經過磨得很快，再較上金。方塊說到最大的像，是睡著的，周圍繞着各種的像，表現着宗教和階級。

不銷，張掖是一個寺院之城，張掖的大佛尤其是容易被人注意的。張掖是在中國的西北的一個最大的城，不僅在河西，並且在甘肅省也要算最大的。城濶的長度，每面有四英里，城是正方形，城牆是兩重厚而且大的磚包成的。從東北角地處繁榮的城，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城外四望，都是灌溉系統優良的田地，圍繞着這一個城池。城池的郊外種着小麥，大麥和玉蜀黍。並且因為北面有祁連山擋着北風，使得氣候不至太冷。張掖以西到高台附近，還可以種葡萄，此外蘋果和梨也種着。在城垣的附近，還有許多果園，梨，桃，杏等，更有許多葡萄園。

有紫色和白色的葡萄。交春以後，涼涼的露水灌下來，充滿了大小溝渠，並且大小的小車道，有時也變成淺淺的小河，使得從那間這一處到那一處，驢馬拖着車循着水裏走，因此車輪也變得很大。

甘州不乾，涼州不涼，這是河西一個俗話的俗話，張掖不僅可以利用祁連山的雪水，並且在城垣的附近，出現了不少的泉源。在城中的一個高處下望，最先觸目的便是城垣的角，除去西北一角以外，全是長滿蘆葦的草湖。這些草湖要佔城內一半以上的地，尤其城東南角的草湖，格外大。在草湖的附近，並且長滿了不少的樹。在城中許多房屋當中，平着高聳的寺廟屋頂格外的顯著，中間並夾着兩個塔，但是住家的屋頂反而被掩住了。

張掖最著名的是廟宇，自然是大佛寺。大佛寺本名安仁寺，西夏永安元年建，明永樂九年和萬曆二十二年都曾修過。現在廟宇為雍正十二年甘肅道岳禮，甘州知府馮祖悅，知縣李廷桂等重修。寺在廟大西面一個巷子裏面。和臨街的山西會館緊鄰。這個寺院的結構是前殿三間山門，中間是正殿，後面是一個祭俱殿。現在前殿的山門已經作了衛生院了。中間的大殿寺前保存，不過在旁邊另開一個門，將廟房住上軍隊，不得軍隊的允許不能隨便進去。後面的祭俱殿和周圍的房子，那就破爛備備連屋子也封上，無人來管。中間的大殿，殿的是佛道像，侍立着弟子和

的春農徵收實產的方法，應採用徵收財產稅和徵收工人的方法來補足這缺額。

總之，多種主義的經濟學是次種的經濟學，這就變成了種種制度。自從日本佔領南洋羣島，日本國威的顯赫似乎已到了頂點。可是金塔塔的下層日本農民却日感貧苦，生活一天天的艱難，斯百思先生說：「在日本國民徵收之消費稅約佔全數之半，試問這巨大的消費稅是從誰徵收來的。日本農民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這些農民大多整天天在困苦之中，農村負債已達不能償還之程度。許多日本人歸怨於他國土渺小，人口繁雜，其實真正要解決日本的農村問題，若就對外發展來想，只有到美國去是種種方面都適合的。此外的發展，如澳洲等地，為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與中國人競爭，徒然大費資本家發財，於大多數國民不無無利，反而增加無窮的負擔。」

格魯氏說：「尤其重要的，日本農民負債日益增加。因為農民的貧乏，城市中的賤價食物隨即發現。因為貧窮，他們便不得不把子女送到工廠裏去工作，獲得一些現代國家中最低的工資。日本農民的貧苦和生活程度之低下，便是日本國際競爭的顯紐。中國戰爭，無論在滿洲事變或在以後的事變中，對於日本的農民毫無裨益，農家的子弟却犧牲了許多。農民又要納稅。他們在高價的市場上，用賣了生產品，目的食糧短缺，使他們幻想將來的繁榮，但是日本的農民，第一個而且永遠的做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者。」

(五)種族戰爭。日本軍人不相信用經濟的理由或宗教的理由或陳腐的權力政治的理由來阻遏人際作戰，因此他們祇能鼓吹種族戰爭：用一種存空間——要擴張國家的空曲的理論來欺騙人民，使

其人。佛像的體態是靈敏而大膽，自然這個像便
對西夏深處的洞窟，不過經過歷次的重修，使得泥
土和泥印不壞。佛像的全身現在也變成紅色的天
衣了。但原日的設計尚可大略想見一部分。其侍立
的夫人像也經過世修過，但佛乘尚帶着未熟的規模
。這之這佛像像身內存有的大像並非曾經修過而
精細別樣過，更增其他本身的價值。在現在本寺
地方行政當局經過保護之下，這確是一個危險的事。

大約的體態已無後世修過，大殿的木構，更完
全被清代翻造過。現在大殿內面看來七間二層，內
面完全是打通的，樓上以四兩有個走廊，中間却是
由底至頂完全相通，結構甚為嚴謹。不過從斗拱方
面看來，完全是清代西式樣式甘肅的建築，明武
宗的斗拱形式，完全和內閣明式樣相同。到清代却
大加改變，在兩兩的兩點，是編作個伸格格外長，
并且都變成一個一個的圓頭。在兩兩却將斗和拱變
得都滾了，只有一層一層的雕花木板，從簷下排
下來，顯出從斗拱變來的痕跡。大殿的斗拱便是
這種形式，決無在清代以前的可說。

後殿的形體完全西式樣，和北平白塔寺
的塔大小差不多，只可憐塔頂被民國九年大地震
震塌了。塔頂的銅盤也震下來了。這佛塔的結構雖
然是元代前後佛宗的建築，塔四周的殿宇，裏面的
佛像和外面的建築，也是明代以前的。大殿的建
築簡單，不過現在取捨的更實，並且已處於無人
管顧狀態之下。不其以佛塔是損壞無餘了。
不在這裏以佛像的體態是西夏寺，西夏寺
前殿是明代時期的，這是在明代時期的佛塔等處。

現在這堂建築甚古，斗拱及壁畫的形式，皆至少為
明代或明代以前，其壁畫雖多已剝落，但其結構與
敦煌的元洞相近。經堂正頂的天花，中寫蓮井，和
明天順時北平的智化寺同類，而明代晚期的天花並
無蓮井。所以此寺的經堂，頗有明初的可能。殿內
的本尊像也是一個明塑。所以就經堂本身而論，並
無清代改修的痕跡，只有外邊的捲棚，是清代接出
來的。

西來寺的門是向東的，經堂在北，南面的院子
，却顯然是清代補修的。最前是西方三聖及華嚴，
觀不若佳，兩廊有壁畫，畫佛故事，壁畫雖有唐
法，在精畫中可稱上品，只是剝落太甚。有碑云東
藏郎姓，此為其精舍，康熙十一年改寺，五十九
年即修。雍正九年七月落成。後院正房為藏中藏清
刊宋印藏文大藏經，樓下為塑像，塑宗喀巴，甚精
。兩廊之壁畫皆藏像，有老喇嘛和他的徒弟看經，
尚能保存，其河精有藏喇嘛住上人家，將全寺隔
得七零八落，太不像樣了。

西來寺的南面是十方院，這也是一個很著名的
寺院。現為張家師範的附屬小學，對於寺院尚沒有
什麼損壞。寺院雖小，塑像却精，塑本尊及二菩薩
，大抵是番子塑的小說河西漢人工匠的手法，尚存
法度。
十方院的前面，是木塔寺，現在為儲備師範，
能像為前殿的軍隊所毀，甚至牆板都撤去燒火，毀
壞甚甚。現在張家師範就原址修補，但法像莊嚴
，也不可謂了。張家師範寺是在六朝時，隋開皇二年
重建之明承續重修，清初承續入藏，家致毀壞。

他們盲目地順從政府的行狀。
可是一種民族戰爭。實是一個危險的名詞，所謂
「大和民族」並非非常含糊。桂魯氏說：「日本
族的來源也許永遠是一個爭執。所謂「大和民族」
中日本人的血統和形貌非常複雜，然而日本人強
他們是一個種族而且最優越的上天授命的種族。他
們所一致認為的大和民族的祖先在耶穌時代尚未開
化，而那時大體上正當是中國的漢朝却已有着燦爛
的文化。他們把頭腦簡單的野蠻人的圖騰制度和靈
魂的信仰攪和在救長大神的崇拜之中，那一種天神
的崇拜，即是日本，並他們自稱為真正的人上
一的原始的六神的子孫，太陽便是那天神的顯示。
這樣發展的宗教，決不是中古和近代日本早期在嚴
肅和愛國的人與中間也帶起來的那種簡單而虔誠的
神道教派。這種現代種族優越的崇拜，對於他們認
為尊貴的皇室和易於欺騙的民衆是一種侮辱。這樣
的崇拜簡直毫無宗教意味而成為冷酷的政治——成爲
殘暴和野心的軍事機器的宣傳工具。」（見「使日
阿爾特」第八章）

在這種種族優越的崇拜之下，社會中却仍潛伏着
一種畏懼外人的心理。齊百里先生說：「會的宣傳
意是擴大，牠的內容是空虛。惟如今將崇拜的心
理轉到了嫉妬上去。」一方面對中國用兵，一方面
却主張人種戰爭。而畏懼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
一樣，潛流於一般社會中。

雖然日本的政治經濟有着巨大的弱點，海陸軍
備有着相當的擴張，教育制度和方法的不健全，種
族優越理論的虛偽，而軍事上的失敗，這這個軍國主
義，我們非要求盡全力不可。齊百里先生在日本
大「的後正使那位紅鬍白髮的學者最後重重地擊
他說話，「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因他（日本）
本」得和「」這句話實給我們很大的警覺。

